

历史译丛

LISHI YICONG

4

一九六三年

目 录

英国殖民主义者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

准备和发动..... [苏] H.П. 克里曼科 (1)

英国社会和第二次“鸦片”战争..... [苏] H.П. 克里曼科 (16)

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和美国

对东方的研究..... [苏] Ф.А. 托戴尔 (22)

美国的外交政策和自由之幸福..... [美] S.F. 贝米斯 (67)

书评与文摘

关于德国对待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政策的两个文件

(1889—1894年).....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H. 施托克尔 (79)

《古巴及其与美国的关糸的历史》(第一卷)

(1492—1845年)..... [美] R.F. 史密斯 (82)

学术生活

墨西哥的历史科学..... [苏] M.C. 阿尔彼洛维奇 (83)

零訊： 美国出版有 [] 的历史

新著 (

朝鲜、苏联历史期刊要..... (87)

英国殖民主义者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准备和发动

(苏) 克里曼科 (Н. П. Клименко)

英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史学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问题加紧进行捏造。这种作法,主要是为了推卸英国资产阶级发动掠夺性的殖民主义战争的责任,并为奴役中国的殖民主义政策进行辩护。在殖民主义体系处于瓦解和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蓬勃高涨的时期,英国资产阶级对类似的辩护性文献的需求大为增加。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们在这方面发表了许多新论著的原因。

资产阶级史学为 19 世纪中叶英国在中国实行的殖民政策进行辩护的思想,在英国史学家莱特的一部著作里表现得最为露骨^①。这本书硬说中国政府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唯一罪魁祸首,因为它对英国极端无礼,根本不願同西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等等。莱特写道:“尽管美国、法国和英国为巩固和扩大这一友好关系而作了一切努力,中国的反动势力……却丝毫不动于衷。”^②另一位英国现代历史学家科斯亭则力图证明,英国在这次战争中所抱的目的不过是迫使满清政府承认其他各国的平等地位而已^③。1954 年,伦敦出版了一本《第二次对华战争》^④的文件汇编。这本书的目的,仍然在于论证中国是这次战争的祸首。同时,在美国由史麟书出版的中国文件的英译本^⑤,也同样是为了粉饰西方列强与美国在中国所实行的殖民主义政策。

在苏联的历史论著中,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与策动问题,在一般的外交史和远

① 莱特:《赫德与中国海关》(S. F. Wright. Hart and Chinese Customs. Belfast, 1950)。

② 同上,第 123 页。

③ 科斯亭:《英国与中国》(W. C. Costi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1833—1860. Oxford, 1937), 第 205 页。

④ 《The Second China War. 1856—1860》, London, 1954。

⑤ 史麟书:《中国筹办美国夷务始末:1841—1861 年中美关系的研究》, (Earl Swisher. China's Management of the American Barbarians. With Documents. New Haven, 1953)。

东国际关系史(見A.A.納洛契尼茨基教授編写的章节^①)中都有所論述。它們用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 19 世紀中叶远东的国际关系,闡明了資本主义列强的外交政策在策动殖民主义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揭露了英国在鴉片战争期間对中国所实行的殖民主义政策的实质。然而在苏联的历史著作中,还没有对第二次鴉片战争的起因和策动問題作过专门的研究。

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討第二次鴉片战争的起因問題,揭露資产階級史学在这个問題上的烂言。同时作者也試圖論述一下策动这次战争的历史条件,特别是印度人民起义对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中国的政策所起的影响。

第一次鴉片战争结束后,中英貿易有了飞快的发展,絲茶貿易的增长尤为显著,这給英国商人带来巨額利潤。1842年中国輸往英国的茶叶为 370 万磅^②,1849年上升到4222.2 万磅^③。到50年代繼續飞漲,这从下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中国輸往英国的茶叶数量^④

年	1850	1851	1852	1853	1854	1855	1856
磅	53,961,000	64,020,000	65,137,000	72,906,000	77,217,000	86,509,000	91,035,000

由此可見,从第一次鴉片战争到第二次鴉片战争这段期間,中国輸往英国的茶叶几乎增加两倍。

中国运往英国的絲的增长幅度还要大一些。1845年絲的輸出量达10,727包,到 50 年代中叶增长的特別快。

中国輸往英国的絲的数量

年	1850	1851	1852	1853	1854	1855	1856
包	16,131	22,143	23,040	25,571	61,948	51,486	50,489 ^⑤

从上表清楚地看出,1850—1856年,中国輸往英国的絲的数量增加到 3 倍多。

在这个期間,中印貿易也迅速发展起来。这是一种“几乎完全是以白銀与鴉片相交

① 《外交史》(《История Дипломатии》),莫斯科1959年版,第1卷;《远东国际关系史》(《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1840—1949)》,М.1956)。

② 《經濟学家杂志》(《Journal de Economist》),1859年第10期(赫梅洛夫藏本,第三集,《中国》)。

③ 《經濟学家》(《The Economist》),1856年10月。

④ 同上。

⑤ 同上,1856年10月。

换”^①的貿易。1840年从印度运往中国的鴉片为20,619箱,1850年已达52,925箱^②。到50年代,鴉片輸入的数量繼續增长,平均每年达68,000箱^③,也就是比1840年增加了两倍多。

鴉片貿易不仅是在印度的英国殖民主义官僚借以发财致富的最重要手段,同时也是英印政府收入的最主要財源。1856年,印度运往中国的鴉片达3,500万美元,而英印政府从中获得的收入达2,500万美元,即占它的国家总收入的六分之一^④。

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指出,印度生产鴉片并以此毒害千百万中国人民,英国政府应負全部責任,尽管这个政府的代表人物硬說它跟鴉片貿易毫无关系。实际上正是英政府强迫印度农民种植罂粟,監視鴉片的生产过程,严密地壟断这种毒品的全部生产,而后再把鴉片售給走私商人^⑤。

英国政府十分关心鴉片貿易的发展,因为它在英中貿易的平衡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經濟学家》杂志写道:如果忽略中国和印度之間的貿易,那就无法考察英国和中国之間的貿易,因为“印度向中国的輸出,正是英国用来支付进口的茶叶和絲的主要資金来源。”^⑥

在19世紀50年代中叶,中国跟其他一些国家进行貿易的特点是:輸出的商品大大超过輸入的商品。例如:1854年中国輸往英国及英屬殖民地的茶叶和絲的价值达2,420万美元。而同年英国运往中国的紡織品总共只有400万美元。英国在貿易上的入超,是靠輸出鴉片来抵补的。在这一年,由印度运往中国的鴉片达2,400万美元,同时輸出棉花400万美元。这样一来,英国和英屬殖民地跟中国的貿易竟出超800万美元(或200万英磅)左右^⑦。所以英国政府和英印統治集团主張极力扩大对中国的鴉片貿易。

然而,英国資產階級当中的一部分人对鴉片貿易的增长深感不滿,因为它使中国市場大为縮小,使英国工业品的銷售发生困难。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鴉片战争之間,絲、茶和鴉片的貿易迅速发展了,然而英国工业品的銷售則几乎停留在原有水平上。例如,英国在1850年輸往中国的工业品並沒有超过1843年的水平,而1854年的輸出額甚至还比1843年的水平低得多^⑧。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02頁。

② 范文瀾:《中国近代史》。

③ 費正清:《中国沿海貿易和外交》(J.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Cambridge, 1953),第1卷第227頁。

④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590頁。

⑤ 同上,第590—591頁。

⑥ 《經濟学家》,1856年10月11日。

⑦ 柯克:《中国:1857—58年(泰晤士报)特約中国通訊》(G. W. Cooke. China: being 《The Times》 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 1857—1858. London, 1858),第169頁。

⑧ 沙尔琴:《英中貿易与外交》(A. F. Sargent. Anglo-Chinese Commerce and Diplomacy. Oxford, 1907),第132—133頁。

英国工厂主們在签订江宁条約时所抱的急遽增加英国对中国的商品输出的希望，是落空了。馬克思写道：“1842年的条約在促进英国对华出口貿易方面，沒有发生絲毫影响。”^①中国所吸收的英国商品，要比荷兰、澳大利亚或英屬的北美殖民地等国家少一半。中国市场甚至不如西印度群島。

如上所述，妨碍英国商品对中国出口額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鴉片貿易。由于购买鴉片烟，中国居民对其他商品的购买力就大大地下降。馬克思写道：“中国人不能同时既购买商品而又购买毒品。”^②所以鴉片貿易的增长是跟工业品貿易的发展不相容的。1847年为調查中英貿易状况不振的原因而委派的一个下院委员会，曾提出报告說：

“我們认为，妨碍这种貿易发展的原因，根本不是由于中国不需要英国商品，也不是其他国家的日益增长的竞争；花钱买鴉片——这消耗了所有的白銀而使中国人一般的貿易遭受巨大的损失；他們不得不用茶叶和絲来支付其他商品”^③。工业品在中国的銷路是与鴉片貿易的发展恰成反比的。

在英国资产阶级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英貿易状况感到不滿。他們认为英国在对华貿易中所遇到的障碍是一种人为的現象，是中国当局一手制造出来的，可以用武力予以消除。曼彻斯特的商务院正是秉着这种精神来說話的^④。

馬克思指出这种論断是謬誤的，并揭示了英国商品銷路不广的真正原因。他写道：“在以小农經濟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經濟制度下，說不上什么大宗进口外国貨。尽管如此，只要取消鴉片貿易，中国可以……逐漸地吸收更多的英美商品。”^⑤然而，英国商人却没有考虑到决定中国市场状况的这个因素。

跟中国进行貿易的英国商行宣称，江宁条約提供給他們的特权太少了，因此他們要求发动反对中国的第二次战争，以便締結一項新的条約，使中国成为“一个广闊的条約口岸”^⑥。他們断言，江宁条約实际上并未使中国为英国的貿易大开方便之門，因为英国的商品只能在中国的五个口岸流通，而內地的广闊地区始終对他們关得紧紧的。此外，他們还說什么中国当局对英国貿易的发展加以百般限制，并指責它沒有履行条約。

维护英商利益的《泰晤士报》特派記者柯克写道：英国工业品在中国的銷路其所以不广，是因为中国“并没有为英国商品开放門路”^⑦。他又写道：一切禍害在于內地的中国居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02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585頁。

③ 同上。

④ 伯尔考維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商务印书館1959年版，第15頁(N. Pelskovits. Old China Hands and the Foreign Office)。

⑤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605頁。

⑥ 伯尔考維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29頁。

⑦ 柯克：《中国：1857—58年〈泰晤士报〉特約中国通訊》，第198頁。

民連見都沒有見過英國商品，于是他號召人們以開放長江實行自由通商來消除這一“禍根”。他寫道：“讓我們駕駛自己的艦船長驅直入，這樣我們就能夠把自己的商品運到中國內地的任何一個大城市。”^①柯克把長江稱為“中國的門戶”。他指出，開放長江為自由通商口岸，就能夠為英國商人開辟一個無限廣闊的銷售市場，以吸收曼徹斯特、利茲、設菲爾德以及英國其他工業中心的全部產品^②。

英國的一些跟中國市場有關的工商業家的組織，諸如曼徹斯特商會和曼徹斯特工商院，一再要求修改江寧條約和全部“開放”中國的門戶^③。從40年代末期至50年代初期，曼徹斯特商會一再要求政府向中國取得新的特權。1849年7月19日，曼徹斯特的商人寫道：“如果經商的權利只局限於幾個口岸，那我們跟中國的貿易永遠不會得到充分的发展。”^④1850年，曼徹斯特商人的代表要求巴麥尊“糾正使通商局限於沿海五個口岸的錯誤”^⑤。1854年1月間，他們在給克萊倫頓的信中寫道：必須取得在中國全境進行通商的權利，並廢除內部關卡^⑥。

這些要求，得到了以倫敦和利物浦的東印度-中國商會為代表的茶商和絲商的完全支持。以上這四個依靠跟中國貿易而發財致富的英國資本家組織，對於決定英國在遠東的政策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作用。

由此可見，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起因，是英國資產階級為了銷售英國商品而力圖打開全中國的門戶，並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的國家。要求對中國發動新戰爭的，首先是那些跟中國市場有密切關係的英國資產階級集團。英國工業的迅速發展，把擴大商品銷售市場的問題提到日程上來。這也就加劇了正在尋找新殖民地市場的英國資產階級的侵略性。

於是英政府開始準備發動一次新的戰爭。戰爭的目的是為了英國貿易的利益而打開全中國的門戶，使清政府屈服於英國的勢力。工業高度發達的英國在落後的封建中國的統治地位的確立勢必長期阻礙中國的發展，使中國成為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列強的商品銷售市場和原料來源地。

英國政府的侵略計劃在徐徐展開，巴麥尊於1850年9月29日寫給英國駐華外交代表的信中說：“我清楚地看出，我們應當再次打擊中國的時刻即將到來。”^⑦

中國國內的形勢有利於英國殖民主義者實現這一計劃。中國封建社會的階級矛盾已

① 柯克：《中國：1857—58年〈泰晤士報〉特約中國通訊》，第204頁。

② 同上，第206頁。

③ 費正清：《中國沿海貿易與外交》，第374頁。

④ 前引伯爾考維茨著作，參看第15頁。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前引費正清著作，第380頁。

經发展到极其尖銳的程度。遭受封建地主阶级殘酷剝削的农民的处境逐年恶化。1850年中国历史上的一次規模最大的人民起义——太平軍起义开始了。太平天国运动使得英国殖民主义者惊恐不安。1853年5月17日英国外交部长克萊倫頓写給駐俄大使西摩尔的信中說：“虽然中国政府出动了全部武装力量，严重的危險仍然威胁着外国列强的商业利益。”^①当时在英国，有人主張列强立即对太平天国进行武装干涉，但英政府认为这种行动不合时宜。它极力想弄清楚太平天国有无屈从于英国的可能，同时还想利用清政府的困境来迫使它作出必要的让步。在清朝还没有完全向英国屈服之前，英国政府决定对太平天国保持“中立”态度，而以后再协同中国的封建反动势力一起击潰太平軍和鎮压中国人民起义。

英政府决定勾結外国列强一道来修改同中国簽訂的各项条約。1853年5月間，克萊倫頓建議法、美和俄国政府共同“利用中国当前的危机所提供的良好机会，来为外国的商业企业打开这个帝国的大門”^②。

跟英国一样，对中国抱着殖民主义野心的法国和美国，表示同意英国的建議，唯有忙于爭夺近东势力范围的俄国放弃了参与列强的这一行动。

1854年，英国、法国和美国的代表要求修改各自跟中国簽訂的条約，提出了新的特权要求，可是中国政府拒絕了这些非法要求。当时英国想立即动用武力，但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把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注意力和武力轉移到爭夺近东霸权方面去了。

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的結束使英国殖民主义者有可能重新实现其对中国的侵略計劃。英国外交家想找一个合适的借口，結果很快就找到了。1856年10月8日，中国当局逮捕了“亚罗”号船上的中国水手，因为他們中間藏有搶劫商船的海盜。尽管中国当局的这种作法完全正当，毫未触及英国的利益，不料英国政府及其外交官竟提出責难，揚言中国当局曾侮辱了英国国旗，并違反了1843年中英补充条約中的第九款。按照英駐华代表包伶的指示，在广州地区的英国舰队开始采取軍事行动。10月23日，保卫珠江口的各炮台被毀。10月28日，英舰队又炮击广州，毀坏民房約万間，使数万居民流离失所^③。而英国外交代表們的这种举动，却得到了巴麦尊政府的嘉奖。

广州地区的挑衅行动迎合了英国工商界的心意。1857年1月6日当炮击广州消息傳到英国之后，倫敦的东印度-中国商会主席格列遜立即写信給外交大臣克萊倫頓，信中縷述了直接或間接跟鴉片貿易有关的倫敦絲、茶商人的要求，其中既有經濟的，也有政治的。要实现这些要求，就必须完全开放中国門戶，使之淪为殖民地。

① 《紅色档案》，1927年，第2卷(21)第183頁。

② 費正清：《中国沿海貿易与外交》，第414頁。

③ 前引石麟书著作，第427頁。

倫敦商人要求外国人有自由进入广州的权利。信中表示希望,如果西馬糜各厘海軍上將一旦不能从中国当局手里取得这种权利,英国政府就应当采取“迅速而有力的步骤以保证这一重要条件的实现”^①。倫敦商人还写道:这个口岸的全部开放,就会促进貿易的迅速发展,这正如近来上海和北方其它港口的情况那样。該商会提醒政府不能抱寬容态度,因为这会助长中国当局的頑固性,使問題拖延不决^②。在当时情况下,这种論調不啻是公开号召对中国发动战争。

这封信还建議英国政府利用所发生的冲突来迫使中国签订新約,使英国商人获得新的特权。新条約应包含如下要求:开放中国全部口岸为自由貿易港;降低关税稅率;給予英国臣民在中国内地自由通行的权利(也就是在全国各地自由游历);允許中国商船进入香港;英国商船有在各大河流通航的权利;在北京派駐常駐外交使节等^③。这些要求的实现,将使中国主权丧失殆尽,淪为英国的半殖民地。

这一侵略计划得到了英政府的贊同。外交部通过該部官員E.哈蒙德轉給东印度-中国商会一封回信,答应将尽一切可能来实现商会信中所提出的建議^④。哈蒙德接着写道:《克萊倫頓伯爵非常乐意在同中国签订新条約方面接受东印度-中国商会所提出的一切建議和意見》^⑤。利物浦市的东印度-中国商会于1857年1月29日向克萊倫頓提出的要求,也同样得到了英政府的积极响应。

利物浦的商人在信中宣称,广州冲突是改变中英之間一切政治和通商关系的有利的借口。他們要求派遣一名高級外交代表到中国签订包括下述条件的新条約:在北京設立英国使館;在海岸和江岸开辟新港口,并在这些港口設立英国領事館,給予領事跟中国地方当局自由联系的权利;規定出口的关税不得超过商品价格的5%。最后,利物浦商人要求給予英国軍艦以自由进入中国任何港口的权利^⑥。这一切都說明,利物浦商人要求象支配印度那样地来支配中国。

在香港和上海的英国商人,也同样要求本国政府不把冲突局限在广州地区,而要发动入侵全中国的战争,迫使中国接受新的奴役性条約。香港商人要求:彻底开放广州为通商口岸,取消内部关税;允許英商同中国商品生产者和消費者以及中国商人建立直接联系;开放新的江岸;中国政府应取消禁止某些商品出口的限制^⑦。

① 《有关英国海軍在广州行动的文件資料》(《Papers Relating to the Proceedings of H. M. Naval Forces at Canton》。London, 1857)第17号第145頁。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自由新聞》(The Free Press), 1857年1月14日。

⑤ 同上 1857年1月14日。

⑥ 《有关英国海軍……資料》,第9号第146—147頁。

⑦ 《額爾金特別使命匯編》(《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 1857—1859》。London, 1859)第50号文件。附录2,第70—73頁。

上海英商写道：英国商品的銷售情况极不令人满意，而这是由于中国把对外贸易限制在五个口岸所造成的^①。因此他們要求：开放新的口岸（天津、汕头等）；享有在中国全境自由游历的权利；在长江这条“中国貿易的主要动脉”中自由航行^②。上海商会要求豁免供外国人消費的商品的关税。在免税商品清单中，还列有麻布、帆布、麻紗、凡而紗及毛毯等，以促进“中国人对它們的消費”^③。上海英商要求中国棉花免税出口，要求每隔五年修訂一次稅率，要求使鴉片貿易合法化，以及在北京設立英国使館^④。

在中国从事鴉片貿易的英印商人的要求，十分簡明扼要地发表在加尔各答市发行的《印度朋友》（《Friend of India》）这个报纸上。这些鴉片商人鼓吹彻底征服中国，使其沦为英国的新殖民地。它写道：管理英国的执政者，“是会英明地看到，英国会在新加坡海峡后面找到第二个印度”^⑤。

跟茶叶商人和鴉片商人站在一起的还有“上帝意志”的傳播者——英国傳教士。他們也要求发动反华战争，迫使中国簽訂新的条約。条約中应規定中国人有自由信奉基督教的权利，而傳教士則有在中国全境游历的权利^⑥。

以上这些人都是英国新殖民战争的主要鼓吹者。由此可見，发动这一战争的原因并不在于“中国皇帝的高傲不逊”，而在于英国資本家力图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的国家，变为傾銷工业品的无限广阔的市場。正是为了英国商人和找寻新市場及原料来源地的工业資本家的利益，英国政府才决意发动侵华战争。英国政府认为，英国外交人員在广州地区挑起的武装冲突足以作为向中国提出修改条約的要求的根据。

1857年3月，額尔金被任命为英国駐华全权专使，由他来“調整对华关系的問題”。

英国对华政策的目的和任务，見諸外交部长克萊倫頓給額尔金的指令。指令清楚地暴露了英国对华政策的侵略性質。它規定，額尔金将在中国拥有应当用以解决面临任务的大量兵力。指令中接着提到，如果中国皇帝派出代表而英-中談判有可能实现的話，应当向中国提出以下五項要求：1. 賠償不列顛臣民在广州地区冲突期間所受到的一切損失。2. 广州及其他口岸应完全履行条約中規定的条件^⑦。3. 支付給不列顛臣民和受英国保护的人們以賠償金，以补偿他們在广州事件中所受的損失。4. 中国政府应同意英国在北京

① 《額尔金特別使命汇編》，第50号文件，附录1，第64頁。

② 同上，第64頁。

③ 同上，第62頁。

④ 同上，第63頁。

⑤ 《泰晤士报》，1857年2月2日。

⑥ 《額尔金特別使命汇編》，第133号文件，附录1，第252頁。

⑦ 根据江宁条約的英文本，英国人有权居住在广州任何地区。但据中文本，外国人只能在通商口岸的港湾和船只停泊处附近就居。由此可見，指責中国破坏江宁条約，是没有根据的。英国外交家所提出的責难只不过作为侵略的口实而已。

設常駐使节,或同意英国政府得随时委派駐华使臣訪問京师。5.修改条約,給予英国貿易方面以更多的特权^①。指令中同时指出,首先应当提出前三項要求,在它們被接受之后再提出后面兩項。假如中国政府拒絕談判或不接受这些要求,額尔金应当訴諸武力^②。

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所謂的“补充指令”,这个指令提出应当取得貿易特权,这也正是英国政府决意发动战争的原因。指令指出,虽然在江宁条約簽訂后英-中貿易有所发展,但远远沒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指令接着还对通商仅限于五个口岸以及只容許中国商船从这些口岸进入香港的限制表示不滿。克萊倫頓写道,額尔金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設法打破对华貿易的种种“限制”,并迫使中国政府“允許列强的臣民自由地跟中国内地各大城市保持联系,特别是跟那些位于主要河流沿岸和临近东北海岸的大城市保持联系。”^③克萊倫頓还強調必須在长江流域取得貿易权。因为英国商人一向把长江看作是中国貿易的主要动脉。此外,他指示額尔金要設法廢除禁止鴉片貿易的法令,从而使中国成为傾銷这一毒品的公开市場。

克萊倫頓最后表示希望,在談判新的貿易特权的过程中,額尔金会得到法、美代表的支持,因为西方各国在这些問題上具有共同的利益。

这些指令表明,英国資產階級力图大大扩展它在江宁条約中所得到的权益。如果他們的这些要求得以实现,那就意味着英国在中国的經濟和政治地位大大加强,它是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一个重大的新步驟。

其他殖民主义列强的統治集团,也决定利用当时的形势来迫使中国接受新的不平等条約。英、法、美和俄国的統治階級都想对中国实行殖民主义奴役,这为它們在第二次鴉片战争期間的外交合作奠定了基础。然而这是一种殖民主义强盜的合作。它們首先只想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不让自己的“同盟者”扩大在中国的势力。因此,随着殖民主义者这种“合作”而来的是激烈的竞争。

法国政府决定直接参与反华的武装侵略。法国資產階級力图进一步滲入中国的市場,想在中国扩大生絲收购业务和大量傾銷商品,同时还想巩固它在中国的代理人——天主教神父的地位。所以拿破侖第三政府一直在拟定侵占中国和越南沿海基地的計劃^④。此外,法国殖民主义者其所以参与对中国的侵略还出于这样一种打算:即在法国对越南的侵略活动中使英国确保友善中立的态度^⑤。因此,法国在1856年12月跟英国締結了共同侵略

① 《額尔金特別使命匯編》,見第3号文件,附录2,第3頁。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2号文件,附录2,第4頁。

④ 前引俄文版《外交史》,第2卷第771頁。

⑤ 納羅契尼茨基:《資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主义政策》(А. Л. Нарочницкий. Колони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держав на Древней Востоке 1860—1895, М., 1956),第80頁。

中国的协定,但这并没有缓和英法在远东的尖锐矛盾。法国的外交态度是竭力不让英国在中国建立它的统治地位^①。为了这个目的,法国决定跟美国和俄国采取一致行动。

美国政府决定在道义和外交上支持英国侵略中国,同时它自己也想迫使中国接受奴役性的条约。美国总统布卡南把英国的侵华活动说成是“公平而便利的”^②。当时的国务卿麦西也向驻华盛顿的英国大使宣称,美国政府“完全支持”英法想在北京设立常驻外交机构并取得贸易新特权的意图,同时表示美国愿意在实现这些目的方面给予协助^③。然而美国政府并没有直接参与这次战争。代替麦西职务的国务卿克斯在跟驻华盛顿的俄国大使斯捷克尔谈话时宣称:“如果盟国取得新的贸易特权,那么我们也要求得到这些特权。”^④中国历史学家范文澜写道:美国在当时的政策“是追随英国之后,援例要求,均沾侵略的利益”^⑤。

同时,美国政府竭力不让英国在中国过分扩大势力范围,尽力利用英国同俄国在远东的矛盾以遂其私利。美国国务卿在跟斯捷克尔会谈中谈到,英国在远东方面的计划威胁着俄国的太平洋领土。他说:“英国打算跟你们闹翻。我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一再提醒您,英国正以嫉妒的眼光注视着你们的领土。”^⑥美国和俄国的代表力图采取一致的行动来对付英国。

俄国外交界密切注意英国在中国的活动。它决定不袖手旁观,无论如何要从中国获得新的特权。同时,英国的活动也引起了俄国政府的深切不安。俄国政府特别担心英国将全力阻挠俄国解决俄中边界问题;它还担心,英国政府在对华战争结束后会派舰队开往黑龙江口^⑦。因此,俄国政府一方面支持英国向中国所提出的符合于一切殖民主义列强利益的条件,另一方面又竭力不让英国在中国大大加强其地位。

1859年4月21日,额尔金动身前往中国,率领士兵1,500名。此外,听候调遣的在香港还有750名英军和350名印军。英国政府还打算从马德拉斯和新加坡抽调军队到中国^⑧。5月20日,额尔金到达锡兰时得到有关印度爆发人民起义的初步消息。

印度事件使额尔金深感不安。虽然,根据初次传来的消息还很难断定这次起义的规

① 德門捷夫:《法国在中国和印度支那的殖民主义政策》(Ю. П. Деметьев. Колони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Франции в Китае и Индокитае. 1844—1862, М., 1958),第74页。

② 刘大年:《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页。

③ 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总类档案1—9,1856年,ОП. 8, Д. 11, ЛЛ. 10—11。斯捷克尔致戈尔恰科夫信,1857年10月7日。

④ 同上,ОП. 8, Д. 16, Ч. 6, Л. 112。1857年斯捷克尔紧急报告抄本。

⑤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1955年第9版,第171页。

⑥ 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总类档案1—9,1856年,ОП. 8, Д. 16。斯捷克尔致戈尔恰科夫信,1857年1月18日。

⑦ 苏联国立中央海军档案局,海军部办公厅(Ф. 410), ОП. 2, Д. 1159, ЛЛ. 634—635。康斯坦丁大公致东西伯利亚省长的信,1858年2月7日。

⑧ 《额尔金特别使命汇编》,第1号文件,附录,第1页。

模和力量的大小,但这位英国专使已经很明确地预感到它会严重地影响到英国在东方的地位,并势必在中国引起某种反应。使他感到不安的,首先是这一起义“将会贬低英国在东方的威信”^①。额尔金原来打算尽快地解决中国问题,以便利用他指挥下的军队来扑灭印度起义的火焰^②。可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事实上不得不首先镇压印度的起义,随后再处理中国的事情。

6月3日,额尔金来到新加坡,而印度总督坎宁向他告急的信却先他而至,信中说起义规模日益扩大,要求从速增援^③。

额尔金清楚地看到,威胁英国资产阶级殖民主义利益的主要危险来自印度。因为那里如火如荼的人民起义,使英国在东方的殖民主义统治的基础有瓦解之虞。所以他马上答应了坎宁的请求,把原定要派到中国去的1,700名士兵从新加坡调往印度^④。其他准备侵华的军队也改变了原定行程。根据印度当局的请求,开普省殖民总督也把炮兵和原定支援额尔金的三个步兵团调赴加尔各答^⑤。随后,额尔金又把香港的海军陆战队抽调到印度。

印度起义事件使英国统治集团焦灼不安。俄国大使馆曾向本国政府报告说,伦敦人士把印度起义看作是对“英国人在亚洲统治的严重威胁”^⑥。印度起义的消息在英国政府中引起了惊惶失措的反应。在刚刚接到起义消息之后,巴麦尊便立即会见法国伯爵皮尔西尼大使,向他表示,“鉴于当前急需把现有的全部兵力集中在印度”,英国政府不可能对中国采取原定的行动措施^⑦。他请求法国政府在对华行动方面跟英国结成公开同盟,“并在军事行动上起主要作用。”^⑧

由于印度人民的起义,才使侵略中国的行动退居第二位。英国政府和整个欧洲舆论的注意力也从中国转到印度。《俄国信使》写道:“中国问题已经不成为头号政治事件,它甚至在英国也失去原先的意义,只有对这个问题有切身利益的人还抱有若干兴趣。”^⑨克萊倫頓给额尔金的信说:“政府对于不得不把原定用于中国的兵力调往印度这件事深感遗憾。但它相信您会同意这种看法,即目前印度政府所从事的这场斗争具有首要意义。要求赔偿英国人在中国所受的损失这件事,跟恢复英国当局在印度的统治权比较起来,应

① 《额尔金伯爵书信日记集》(《Letters and Journals of James Eight, Earl of Elgin》, London, 1872), 第185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187页。

④ 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834—1860年冲突时期》,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551页。

⑤ 同上。

⑥ 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办公厅全宗,Д.105,Л.191,赫列普托維奇致戈爾恰科夫的信,1857年9月12日。

⑦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1857年6月30日。

⑧ 同上。

⑨ 《俄国信使》(《Русский Вестник》),1858年第2期第223页。

当退居次要的地位。”^① 克萊倫頓接着提出保証說：“印度方面的要求一旦得到滿足，我們一分鐘也不會耽延地馬上撥給您為完成原指令所需要的兵力。”^②

額爾金幾乎把自己的全部兵力都投入印度，但他希望這些軍隊能很快再歸他調配，或是另派一些軍隊來代替它們，以免妨礙他完成自己的使命^③。可是這些希望落空了。7月2日，額爾金來到香港。不久他就跟法國和美國的代表進行聯繫，以試探跟他們合作的可能性。7月3日，他寫信給法國代表布尔布隆說，他打算到白河口跟中國政府就排解衝突和擴大通商事宜進行談判^④。同一天，額爾金又致函美國駐華全權代表伯駕，邀請他一起參加這次跟中國政府舉行的談判，以解決列強跟中國擴大貿易聯繫的問題^⑤。幾天之後，布尔布隆在復信中借口政府沒有授給他全權而拒絕給以支持。但這不等於說法國不打算跟英國一道進行反華戰爭，它不過是想抬高援英的代價，使英國贊同法國對印度支那的侵略。

那位假仁假意地侈談美國“中立”的伯駕，當時也拒絕跟額爾金合作。他認為，中國政府只有吃了敗仗以後才肯簽訂新的奴役性條約。

法美代表拒絕合作的态度，使英國專使意外地孤立，使他的全盤計劃有破滅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額爾金只能指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如果原定開赴中國的那些軍隊能全部按計劃到達，他就能夠按照上級指令行事，而無須他國幫助。然而印度人民的起義使他喪失了這種可能性。額爾金事後總結說：“在香港我簡直成了光杆司令”^⑥。

《泰晤士報》以諷刺的筆調寫道：“額爾金伯爵陷於跟閱希豪森男爵^⑦同樣的處境：男爵回頭一望，發現他那匹馬的後半個身子不見了，只剩下前面的一半，這是因為那扇用力關上的門把馬截成了兩半。現在這位到中國去的專使也同樣地回頭一望，結果發現他的軍隊不見了……在額爾金那里，只剩了這匹馬的頭部——外交使命的部分，也就是專使的高貴頭銜和尊嚴。印度起義好比是那扇使勁關上的大門，它撞擊了伯爵的使命，把它攔腰劈成兩段。”^⑧

這位英國專使非常了解，在這種情況下胁迫中國政府舉行談判，是註定要失敗的，因為中國政府決不甘願接受他所強求的奴役性條件。科斯亭寫道：“印度起義使額爾金不得不放棄立即跟北京宮廷打交道的想法。”^⑨ 對於香港的英國總督包伶、指揮遠東英國艦隊的西馬廐各厘以及香港的商人所堅決主張的在廣州地區採取軍事行動，額爾金認為無

① 《額爾金特別使命匯編》，第50号文件，附錄2，第14頁。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20号文件，第26頁。

④ 同上，第14号文件，附錄1，第15頁。

⑤ 同上，第14号文件，附錄2，第15頁。

⑥ 同上，第20号文件，第24頁。

⑦ 18—19世紀德國若干文學作品中的冒險獵奇的主人公。——譯者。

⑧ 《泰晤士報》，1857年9月2日。

⑨ 前引科斯亭著作，第234頁。

济于事。据他看来,这些行动不可能对中国施加多大的压力。况且,他所掌握的兵力显然不足以采取这种军事行动。根据英国指挥部的估计,要想占领广州至少必须有四、五千兵力,而当时英国在远东地区的全部兵种共只有1,484人,其中有病员244人,故真正能够参加战斗的只有1,240人^①。7月14日,额尔金又接到坎宁的信,从信中他更清楚地了解:他不仅不能从印度方面得到援军,相反地,还得把自己最后仅有的部队派到印度去。额尔金的秘书奥利芬特这样写道:“坎宁的来信使专使的一切期望落了空,甚至他想保住一部分兵力的打算也没有成功。”^②

可见,印度起义使额尔金在解决中国问题上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正象他自己所写的,在暗淡的前途面前,印度起义“迫使他在香港白白地渡过了三个月的时间,同时也不得不向全世界承认,英国离开了法国就一事无成。”^③据额尔金看来,这无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或是欧洲强国的面前,都大大有损于他所执行的使命的威望。英国专使看到,只有离开中国躲到加尔各答去消磨时间,才是逃避这一处境的唯一出路。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会在某种程度上挽回英国的面子。他决定在法国专使葛历劳士^④到达和有得到援军的切实希望时再回来。额尔金预计葛历劳士将在9月中旬到达。他写道:“这对于在冬季之前跟北京朝廷打交道来说,将是一个大好时机。”^⑤

于是额尔金离开了中国,但他相信在当年就能够跟中国政府进行谈判。额尔金在动身之前指示包伶,在他返回之前要保持现状,以免破坏其他口岸的贸易。他并授命包伶转告广州总督叶名琛说:如果有事相商,英国专使很快就会回来,而且还将率领着军队,因为他这次离开正是为了应接军队。”^⑥

1857年7月16日额尔金率领两艘军舰前往加尔各答,舰上仅有300名水兵。这是在中国的英国武装力量当中仅能抽调出来的最后一支队伍。额尔金此刻的情绪低落。他的顾虑——害怕由于在中国毫无作为而有损于英国的威望——并非没有根据的。俄国驻伦敦的大使赫列普托维奇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谈到,额尔金本应当出现在北京附近,可是却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加尔各答,这可以说是“在严重的局势中出现的一段喜剧性的插曲。”^⑦

当额尔金在加尔各答获悉武装起义的声势不断扩大的消息后,他知道他的军队是不能够很快地从印度抽调回来了。正在这时,他却接到通知说,已经有一个营的印度兵派往

① 《有关额尔金特别使命汇编》,第20号文件,附录2,第20页。

② 奥利芬特:《额尔金出使纪实》(L. Oliphant. Narrative of the Earl of Elgin's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 in the years 1857, 1858, 1859, London, 1901)第1卷第50页。

③ 《额尔金伯爵书信日记集》,第195页。

④ 为了发动战争,法国政府决定派遣葛历劳士男爵到中国,并授权后者解决法中关系的一切问题。

⑤ 《额尔金伯爵书信日记集》,第195页。

⑥ 《第二次对华战争文件集》(The Second China War. 1856—1860),第144号文件第217页。

⑦ 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办公室全宗,Д.105.Ж.191,赫列普托维奇致戈尔恰科夫的信,1857年10月12日。

中国,并从英国调遣了一支1500人的军队归他指挥。这就是全部兵力。额尔金懂得,必须利用有限的兵力在中国开始行动。9月3日,额尔金离开了加尔各答。据他估计,他刚好要在葛历劳士来到的时候到达香港。可是额尔金在9月20日才到达那里,他觉得“现在的情况跟两个月之前迫使他离开中国那时候相比,并没有多大的好转。”^①葛历劳士男爵还没有来到,他也可能会在10月中旬赶到,可是到那时候,由于气候条件不利,也就无法北进了。这时伯驾已回美国,至于新任的美国代表,看来并不会比葛历劳士先到。而在葛历劳士没有来到之前,布尔布隆和法国舰队司令里果又一直坚持绝不采取任何行动,虽然据额尔金看来,他们本来是能够跟他一道去白河口的。

英国人在中国长期无所施展,加上印度的困难,这就大大地打击了英国的威信,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加强中国对额尔金的非分要求的反抗。额尔金断定,在这种情况下要强迫中国政府进行谈判,是不会奏效的。奥利芬特曾写道:这时“向白河口进军,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不可能。”^②

英国专使不得不改变他在中国的行动计划。法国历史学家巴赞库尔曾经写道:“原来的全盘计划都被事变所打乱。”^③额尔金便决定把占领广州作为在中国采取行动的第一步。然后,一方面把广州掌握在手里,作为以后胁迫中国政府接受英国全部要求的“物质担保”。另一方面直上白河口,强迫中国政府进行谈判。这个计划博得了克莱伦顿的赞许^④。但英国专使直到1857年底才有可能采取这种主动。

由此可见,印度人民起义有力地阻止了英国对中国的侵略。印度人民的斗争,给予中国人民很大的帮助。

当中国人民获悉印度人民反对英殖民主义者的消息时,是十分高兴的。广东省南海的一位官员曾记述说:“民间有风声说,英属殖民地孟加拉举行了起义,英国吃了败战。一两个月之后又听到,侵印的英军中了埋伏,全军复没……。这些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人人喜形于色。”^⑤

印度人民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英勇斗争,促进了中国人民反抗情绪的高涨。印度的起义吸住了英国原定用来侵略中国的兵力,因而制止了侵略的扩张。英国史学家艾泰尔写道:“由于印度起义骤然爆发,出兵中国几乎延迟了一年。”^⑥英国政府还不得不改变

① 前引奥利芬特著作,第62页。

② 同上。

③ 巴赞库尔:《对中国和交趾支那的远征》(Bazancourt. L'expédition de Chine et de Cochinchine, Paris. 1861),第1卷第82页。

④ 《额尔金特别使命汇编》,第40号文件,附录2,第41—42页。

⑤ 余绳武等:《19世纪中叶中国和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相互影响》,载《1857—1859年印度的人民运动》论文集,莫斯科1957年俄文版,第243页。

⑥ 伊泰尔:《中国国里的欧洲》(E. Eitel. Europe in China. London, 1895),第314页。

侵略方向——不向白河口进军，而把行动局限在广州地区。

印度起义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使英国在实现自己计划的时候不得不看法国的脸色。因为英国在中国没有足够的兵力，所以极需法国武装力量的支持。

印度的民族起义，向亚洲人民揭露了英国殖民主义政策的掠夺性质。印度人民之所以举行起义，是因为英国殖民主义者把他们弄得贫困不堪，逼得他们无路可走。这次起义，鼓舞了亚洲人民反抗英国殖民主义扩张政策的斗志。

英国入侵中国的计划只是暂时被推迟。而当额尔金作出了夺取广州的决定后，英国指挥部便立即进行备战。他们当时的主要困难是缺少军队。因而，英国军官要求额尔金设法调派援军。这期间额尔金给克莱伦顿的信，不外乎是提出这种要求。

1857年10月至11月间，援军陆续从英国调来，特别是有1500名水兵开到。当葛历劳士男爵到达之后，他对侵占广州的计划十分赞许。英国代表终于有可能采取侵略的攻势，这表现为1857年底对广州的侵占和洗劫。英国殖民主义者就是这样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的分析表明，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对这次战争的起因和谁是祸首的论断，是毫无根据的。战争的起因并不在于清政府的“傲慢”，而在于英国资产阶级的政策。

(韩正文译。原文载苏联高等学校《历史科学报告集》1960年第4期)

美国出版有关西藏的两本书

根据美国《亚洲研究杂志》1963年第22卷第2期的《书评》栏报导，美国出版了以下两种有关我国西藏的著作。现简单介绍如下。

《西藏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ibet)，作者 H.E. 理查逊，1962年纽约出版。作者理查逊是苏格兰人，当过英国官吏，1947年以后，曾在印度作官、后又出使拉萨。该书第一章，对西藏的地理、语言、人种和政府作了概述，第二章简述了西藏的早期历史，所谈事件包括公元后630年至1942年达赖喇嘛统治建立的这一时期。以后十三章叙述了从1720年到目前的西藏政治历史。

书后有一很有用的附录，其中包括：从821年至1957年的各种条约和协定；西藏、蒙古和汉人各代统治者以及西藏摄政者和班禅喇嘛的大事年表。

《西藏的宗教信仰》(The Religions of Tibet)，作者是 H. 霍夫曼，该书原为德文本，1956年在德国出版，1961年又译成英文，在纽约出版。作者按着年代详细地考察了西藏宗教信仰的发展。基本上是一部宗教史，同时也概略地叙述了西藏政治史。第一章叙述精灵论的信仰；第二、三章叙述大乘教中乔答摩佛陀教学的发展；第四章叙述颇母和佛教之间的宗教斗争、以及地方头人和王之间的政治斗争。第五章的主题是，描写颇母同化了佛教的许多特征而形成“白”颇母的过程。第六、七两章叙述佛教之受压迫和在公元第一年末期之复兴，以及后来秘密组织之出现；第八章阐释宗喀巴的改革，以及“黄教”的宗教和世俗权威的建立。

(华)